

汉语学习是汉学家成长的必由之路*

——访俄罗斯汉学家罗季奥诺夫

□ 采访人：关秀娟 王雨欣

□ 受访人：[俄] 罗季奥诺夫 (А. А. Родионов)

访谈按语：罗季奥诺夫，1975年出生，博士，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常务副系主任，中国语言文学教研室副教授，圣彼得堡俄中友协副主席，中国文学翻译家。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俄中文学交流与译介。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译作20多部，包括老舍、韩少功、余秋雨、毕飞宇、曹文轩等文学家的作品。2003—2021年选编29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集，如《红鞋：中国青年作家文集》《中国20—21世纪话剧精选》《世道：广东作家小说集》等。

2021年12月，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研究中心和黑龙江大学在线上联合举办了“中俄文化互译与汉学发展论坛”，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许多知名汉学家聚集于此并热烈研讨，引起了学界对俄语国家汉学研究的极大兴趣。笔者借此机会对参加此次论坛的罗季奥诺夫进行了访谈，从其个人研究领域切入，围绕新一代俄罗斯汉学家的汉学之路、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译研与接受、新阶段中俄汉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三个方面，展现了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代表的俄罗斯汉学研究的现状、特点与未来。

中图分类号：K207.8; G125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23.04.018

一、新一代俄罗斯汉学家的汉学之路

关秀娟、王雨欣（以下简称“关、王”）：罗季奥诺夫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2019年俄罗斯首次把汉语科目纳入国家统一考试，成为继英语、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后，俄罗斯高考外语科目的第5种选择，看得出俄罗斯官方现在对汉语很重视。那么对于个人来说，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汉语的？为什么选择汉语？俄罗斯人喜欢学习汉语吗？

罗季奥诺夫（以下简称“罗”）：我读中学最后一年时才开始接触汉语。学习汉语首先是因为对外语的兴趣，再加上当时苏联解体，国家比较动荡，出于安全考虑，父母就让我留在家乡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市上学。布市距离中国的黑河很近，学习汉语有很便利的条件，实习、工

作机会也很多。

据我观察，从那时起到现在的30年间，俄罗斯的汉语热一直在升温，一方面双方的交流日益频繁，另一方面有一些关键节点。比如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召开，让很多俄罗斯人了解、认识了中国，看到了中国的现代化，所以很多人开始学习汉语。2022年中国再次举办第24届冬季奥运会，相信还会掀起新一轮汉语学习热潮。

关、王：学习汉语并不意味着做汉学研究，您是如何走上汉学研究道路的？

罗：我父亲是大学教授，受其影响我认为从事学术研究非常有意义，也可以说学术研究是我的使命。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一家银行工作，在此期间考入阿穆尔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在谢尔盖·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汉）抗战翻译语境适应机制及其价值研究”（项目编号：19BYY207）的阶段性成果。

洛诺夫 (С. В. Филонов, 1962—) 教授的帮助下又转入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攻读亚非文学专业, 2001 年博士毕业后留校, 开始从事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工作。

关、王: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汉学研究遭遇了人才严重流失、老化和断代的危机,^① 目前, 俄罗斯汉学界比较活跃的汉学家有哪些? 主要研究哪些领域?

罗: 很遗憾, 苏联时期那些优秀的汉学家现在差不多都去世了, 像李福清 (Б. Л. Рифтин, 1932—2012) 院士、司格林 (Н. А. Спешнев, 1931—2011) 教授, 还有谢里布里亚科夫 (Е. А. Серебряков, 1928—2013) 教授、孟列夫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1926—2009) 院士、索罗金 (В. Ф. Сорокин, 1927—2015) 院士、华克生 (Д. Н.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26—2017) 教授和季赫文斯基 (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1918—2018) 院士等。目前那一代伟大的汉学家只剩下米亚斯尼科夫 (В. С. Мясников, 1931—) 院士了, 虽已是 90 多岁高龄, 但他还是经常从莫斯科赶到圣彼得堡参加学术研讨会。

如今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以中年人为主, 但人数不多, 主要在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地。圣彼得堡大学的克拉夫佐娃 (М. Е. Кравцова, 1953—) 教授主要研究古典诗歌, 近几年有一些重要突破, 如编著《中国诗人词典》(Словарь Китайского Поэтов, 2019), 与阿利莫夫 (И. А. Алимов, 1964—) 教授合著《古代至 13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史: 诗歌与散文》(Ист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древности и до XIII века: поэзия, проза, 2014) 等; 圣彼得堡大学中国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索嘉威 (А. Г. Сторожук, 1961—) 教授研究唐代诗歌和唐代文学, 近几年转向蒲松龄研究、《聊斋志异》翻译;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文献所所长波波娃 (И. Ф. Попова, 1961—) 院士和圣彼得堡大学的萨莫伊洛夫 (Н. А. Самойлов, 1955—) 教授以中国历史研究著称。

莫斯科的学者, 如东方学院中国部主任科布泽夫 (А. И. Кобзев, 1953—) 曾在 2020 年获

得中国政府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是研究中国哲学、文化、古典文学方面非常优秀和权威的学者; 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部主任斯米尔诺夫 (И. С. Смирнов, 1948—) 研究中国明清诗歌;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罗曼诺夫 (А. В. Ломанов, 1968—) 研究中国历史和哲学; 刚刚上任的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院长马斯洛夫 (А. А. Маслов, 1964—) 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 还有研究俄中国际关系问题的卢金 (А. В. Лукин, 1961—) 等。

其他地区的有: 阿穆尔国立大学的菲洛诺夫教授, 目前在研究道教的相关问题; 新西伯利亚大学的柯米萨罗夫 (С. А. Комиссаров, 1955—) 教授和沃伊季舍克 (Е. Э. Войтишек, 1961—) 教授等学者在研究中国考古问题, 等等。

关、王: 您是同时代汉学家中的佼佼者, 您这一代汉学研究者有什么共性特征呢?

罗: 关于共性, 首先, 我们这一代 50 岁以下的青年研究者都有留学中国的经历, 汉语口语水平还不错, 与中国人交流比较方便。即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 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与中国学者交流。其次, 我们会更多地使用数字化的学术文献, 比如经常在中国知网以及其他数据库中下载各种资料, 这些资料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研究领域。还有, 十年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 (尤其是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的) 大多参考西方的学术文献, 较少参考中国文献, 但是最近几年大不一样了。因为现在西方文献当中的中国形象跟真实的中国形象已相去甚远, 我们无法再通过伦敦或者华盛顿的视角来研究北京, 所以近些年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参考中国的第一手资料。

关、王: 目前俄罗斯汉学界形成了哪些研究热点呢?

罗: 广义上讲, 经济合作、政治合作、俄中关系问题当然是近些年中国研究的热点所在。就俄罗斯传统汉学来说, 研究队伍小且研究领域分散, 有的人研究刘震云, 有的人研究老舍, 各做各的, 所以还比较难说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前几年圣彼得堡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合作研究项目“俄罗斯和西方在中国的形象”, 围绕这

^① 阎国栋:《俄罗斯汉学的危机》, 载《国外社会科学》2015 年第 6 期, 第 68 页。

一问题项目组 10 个人举行了座谈会，算是形成了一个小组的研究热点，最终也出版了研究成果。目前，尚未出现引起整个俄罗斯传统汉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围绕着一些像“俄罗斯的中国文献”这样的课题还是有一些聚焦的。

关、王：俄罗斯汉学自 18 世纪始，至今已有 300 年历史，在您看来，俄罗斯汉学研究的传统是什么？21 世纪以来俄罗斯汉学研究又有哪些变化？

罗：长期以来俄罗斯的汉学研究相对保守，其中圣彼得堡的汉学研究最为保守。这可能是因为在圣彼得堡东方文献所和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有大量的中国善本和古代文献，这些资料甚至在中国都很难找到。圣彼得堡的汉学家一方面觉得自身有责任做好这些中国古文献的研究，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也可以帮助俄中学者展开大量的合作。所以目前大部分圣彼得堡的汉学家都在做中国古典研究，而莫斯科的学者大部分都在做中国现当代研究。

进入 21 世纪以来，汉学研究的变化首先是研究群体在扩大。20 世纪 90 年代国家动荡、社会不稳定，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发生退化，因此目前 50—60 岁的汉学家特别少。而近 20 年来，汉学家的数量已明显增加，研究质量也在慢慢提升。其次是研究对象也有所转变。以前主要做传统汉学研究，而现在中国研究的概念更加宽泛了，基本上社会科学的每一学科都已开展中国研究。长期以来历史、文学和语言研究比较发达，政治、经济研究占少数，可能是因为三十年前乃至更早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对世界的影响还不明显。而现在中国的声音非常重要，所以许多本来与汉学没有关系的学科也必须开始研究中国。比如，法律方面的学者以前常参考英美方面的法律体系，但是现在他们也关注中国的法制系统，因为中国的经验不同以往。再如，中国近些年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众多突出的成就，经济学领域不可能不研究中国的经济现象。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者可能并不一定是汉学家，但是也加入中国研究的行列中来。

这一现象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如

圣彼得堡大学的汉语教学始于 1855 年，160 多年来都设立在东方系，但是最近五六年，法律系设立了中国法律专业，经济系设立了中国专业，地理学系设立了中国旅游专业，社会学系、政治系、哲学系、管理学院也开设了有关中国的本科或硕士专业。这不是圣彼得堡大学特有的现象，很多俄罗斯高校都是如此，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在做相关的中国研究。可以说，俄罗斯汉学家后继有人，俄罗斯汉学方兴未艾。

二、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译研与接受

关、王：对老舍创作的译介与研究曾经是苏联汉学—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后来有所停顿。但 2001 年您通过答辩的副博士论文《老舍与中国 20 世纪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ЛаоШэ и проблем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X века, 2001) 是近年来俄罗斯研究老舍创作具有代表性的新成果。^①对于老舍的作品，您既研究，又翻译，为什么选择他为研究对象？又有哪些研究发现呢？

罗：这是个人兴趣和导师指导两相结合的结果。首先，老舍是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研究老舍可以算是我的个人爱好。其次，我的导师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司格林教授，他翻译过老舍的很多作品，还在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当代中国史”和“中国人的心理特征”等课程。所以我就选择老舍的作品来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中国作家在“五四”时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这一思想在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均有体现。其实，中国的学者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就讨论过这些问题，我只是以老舍的创作证明了这一点，并做了一些补充。

关、王：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译研中品味到了哪些中国文化特色？又发现了哪些历史变迁？

罗：中国人在某些方面非常打动我们，比如，中国人追求“和”，希望和谐地解决问题，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政府近些年一直在呼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又如，中国人注重“根源”，重视家庭，特别是每年春节期间会有好几亿人参与到“春运”当中，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见到的现象。

① 李逸津：《1990 年代以来俄罗斯的老舍研究》，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 期，第 19 页。

21 世纪以来的 20 年间，中国城市的规模在急剧扩大，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人们从农村搬到城市难免会改变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与此相应，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题材也有着从城市到农村的明显变化，开始关注变化中的农村人。贾平凹的小说《浮躁》就展现了现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一些变化，人们内心产生了一些不踏实感，造成思想混乱，继而体现出这种“浮躁”。

关、王：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在俄罗斯比较受青睐，成果丰硕，学界为什么热衷于这一领域呢？

罗：的确，最近 10 年中国文学俄译有了较大突破，翻译出版了 110 余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包括文集、长篇小说等，苏联解体后 20 年只出版了 20 部，那时平均 1 年 1 部，而现在 1 年 11 部，增长了 10 倍。而且之前 80% 的出版物是中国古典文学，现在翻译出版中国现当代文学已占 50%。应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容易被人接受，传播潜力更大，因为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当代的、发达的、高新的中国，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是可见的。

另一方面，俄罗斯老一辈汉学家对鲁迅、老舍、茅盾、郭沫若等人作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中国当代作品的研究尚显不足。不过，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指引。与前辈相比，我们的优势在于可以经常去中国搜集资料，可以同健在的作家交流，这非常重要，比如做文学翻译时可以直接和作者本人交流，或通过微信沟通可得到及时反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家协会自 2010 年以来，每隔两年举办一次“汉学家中国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为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译者创造了大量与中国作家直接接触的机会。此外，中国一些著名作家在疫情以前也经常来俄罗斯，如王蒙、冯骥才，并与俄罗斯汉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有这么好的条件，俄罗斯的译家、学者自然就多了起来。

关、王：新世纪俄罗斯形成了一些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与研究流派吗？

罗：我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不存在流派。虽然从事翻译工作的有圣彼得堡大学、莫斯

科大学的毕业生，还有在中国留学的俄罗斯人，但这些译者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形成单独的流派。文学研究也没有形成流派。例如影响较大的圣彼得堡“远东文学研究研讨会”，参会学者来自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乌兰诺德等地，大家交流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学派特征。当然，各地学者也有一些特点，如乌兰诺德有很多人在研究中国当代诗歌，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并无特别之处。其实，莫斯科大学也有人研究中国当代诗歌，所以这并不绝对。俄罗斯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队伍并不大，不分什么流派，没有什么对峙现象。很难形成。

关、王：从国际汉学来讲，俄罗斯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与研究同其他国家有哪些不同？

罗：首先，俄罗斯汉学界比较保守，更接近传统汉学，多使用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西方有所不同，他们性别意识很强，喜欢研究与性别相关的各种问题，如从历史、文学等众多角度研究女性主义、同性恋等问题。俄罗斯对这些问题根本不感兴趣。其次，俄罗斯与中国有历史认同感，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俄罗斯也曾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俄罗斯人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与西方学者不一样，与日本学者也不同，因为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俄罗斯汉学高度本土化。根据对近 20 年参加欧洲汉学大会的汉学家的统计，法国、德国、英国、爱尔兰等欧洲国家参会的学者、博士生等多为华人华侨。俄罗斯则不同，绝大部分是本国学者在研究中国。虽然近 20 年孔子学院在俄罗斯比较普及，但该院的中国教师基本上只从事基础汉语教学，不做学术研究，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关系较小。

关、王：文化差异是文学翻译必然面对的问题，汉俄跨语言、跨文化转换过程中应如何处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信息？

罗：异国文化信息在译本中还是应该凸显的，这是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所在。阅读、翻译异国文学作品大多为的是了解、传播不同的文化风情、审美情趣，尽量保留原文中的文化信息是必要的。比如，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书名中就带有中国文化信息，“潘金莲”是中国的一种文化符号，“我不是潘金莲”意味着“我不是荡妇”“我

不是坏女人”。但是怎么译成外语呢？英译为《我没杀过我的丈夫》，法译为《我不是包法利夫人》，用另一个文学形象来代替。我参与了俄语译名的讨论，因为这部小说中很多人物都与中国文化有关，即便书名中隐藏了“潘金莲”，小说的第一页又会遇到另一个主人公“潘公道”，无法避免这些文化问题，所以最终还是保留了“潘金莲”及同类文化信息，通过音译加注解形式处理。

关、王：您曾提到，“最近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并开始积极对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致使中国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发生了重大的突破，但是中国热、汉语热本身还不能保证文学翻译的规模和稳定性”^①。译作的传播和接受至关重要，现在，作为读者的俄罗斯人对译介的中国文学作品接受程度如何？汉学界还需做哪些努力呢？

罗：不同于中国读者对俄罗斯的了解，俄罗斯读者对中国知之甚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是影响力最大的外国文学，而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则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不仅在俄罗斯如此，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虽然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举世瞩目，但不得不说，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还不尽如人意。中国拥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但普通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这就造成了读者在阅读中国译作时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历史人物和文化典故。如前所述，译者试图用注解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样会加重读者的阅读负担，毕竟普通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只是为了获得某种精神体验，而不是像教科书一样获取知识。如果读者在少年时期就阅读过一些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了解一些中国文化，此后再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可能就会容易很多。从另一个维度讲，如果外国人只能看到中国的快速崛起，却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化，就难免会产生对中国的畏惧，“中国威胁论”也会出现。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国家间应该多做一些文化和文学上的交流。

三、新阶段中俄汉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

关、王：近年来，中俄两国汉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您所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俄罗斯对中国兴趣的增长、中国对本国文化走出去的努力推动、中国文学的本质变化，俄罗斯文学俄译数量大幅攀升。”^②俄罗斯汉学新成果问世较快，特别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甚至张学东2020年新出版的小说《家犬往事》，2021年已经出版了俄译本。译作快速出版是怎么做到的？还有哪些译作或研究成果即将问世？

罗：这主要是中俄两国学界、出版界的通力合作。许多中国作家与俄罗斯翻译家都比较熟悉，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比如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日三秋》2021年7月在中国一出版，译者就得到了电子版并着手翻译，俄译本2022年四五月份就会在俄罗斯出版。可以预见，2022年俄罗斯出版的中文译作总体上应该和2021年差不多，在25部左右。目前有几部作品已经译完，待出版，比如罗玉兰（O. П. Родионова，1976—）翻译的黑鹤的儿童作品《黑焰》和《鄂温克的驼鹿》，还有叶果夫（И. А. Егоров，1953—）翻译的山东作家莫言的《檀香刑》和张炜的《独药师》，索嘉威补译的《聊斋志异》。俄罗斯还会出版一些中国科幻小说，特别是刘慈欣的作品。但需要指出的是，刘慈欣的作品都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这样出版比较快，但是质量不太理想。目前圣彼得堡海波龙出版社也与安徽文艺出版社签订了协议，翻译两位安徽作家的作品。此外，也可以期待俄罗斯“尚斯”出版的作品，这个出版社由中国人创办，每年都有很多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项目。

关、王：俄罗斯汉学界同中国学界交流合作很频繁，当前都有哪些具体合作项目呢？

罗：前面已提过的“远东文学研究研讨会”由圣彼得堡大学设立于2004年，每隔两年在圣彼得堡举行一次会议，每次都会跟中国的一个学术组织或者大学联合举办，如与复旦大学合作过两次，与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老舍研

① 罗季奥诺夫：《国家形象与文学传播：有关当代俄中文学交流的几点思考》，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13页。

② A. A. Родионов, О переводе и издании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новейшей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озы в 2009–2018 гг.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АФРИКАНИСТИКА 44. 4(2019): 398.

究会、茅盾研究会、郭沫若研究会分别合作过一次。目前研讨会已发展成俄中文学研究规模最大的会议，每次约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150名学者参加，其中中国学者约占30%，俄罗斯学者约占40%，其他国家的学者约占30%。

此外，一些中国学者申获外译项目后常邀请俄罗斯学者参加，现在每年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都会编辑一本这类的书。去年圣彼得堡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共同翻译出版了《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语言政策篇》(Доклады о язык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Китае: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2021)，这个项目的译者为俄罗斯人，译稿审校是中国人。类似这种项目越来越多地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现在俄罗斯学者也积极地和中国学者联合申请课题，如共同研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馆藏的中国文献，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圣彼得堡大学在与山东大学共同申请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基金会有一个联合课题，整理圣彼得堡某领域中国文献的目录。另外，孔子学院的新汉学计划支持海外汉学家出版著作或举办研讨会，俄罗斯的学者也经常申请这些项目。

关、王：随着中国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视，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外语工作者的重要使命，“研究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世界各国文学中的传播与影响，是外国文学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①，中国国内的国际汉学研究不断升温，您对中国学者从事俄罗斯汉学研究有哪些看法和建议？

罗：前面已说过，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主体较长时间内不会出现类似欧洲的华人华侨替代现象。因为，一方面俄罗斯对移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欧美国家那么大，另一方面俄罗斯对移民的限制比较多，教育主权意识相当强。但是，我觉得俄中之间的联合研究会越来越多，希望两国学界可以不断加深交流与合作。俄罗斯学者很愿意参加文化交流与文学交流研讨会，互通有无，也愿意参与

中国博士生的联合培养，提供研究资料、研究数据、研究经验等支持，助力中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人才成长。欢迎中国学者、学生到俄罗斯交流学习、共同研究。

其实，从中国的汉学研究中，我也注意到俄罗斯目前还没有对中国俄罗斯研究的研究。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探索，甚至不是去研究“研究方法”，而是要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去研究问题，因为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的问题，从这方面去研究可能更有意义，可以彼此借鉴。

关、王：李明滨教授也曾发出号召，“俄罗斯汉学研究大可作为，是一门有意义的学问，我希望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同行继续在这个学科领域努力，把我们的共同事业推向前进”^②。相信未来中国汉学研究者与俄罗斯汉学家一定会开拓更多合作平台，您建议在哪些领域合作，可共同促进俄罗斯汉学的发展？

罗：除上述翻译、研究等领域的合作外，希望两国能够在教育领域加强合作。现在已经有很大俄罗斯高校和中国高校建立了本科或硕士的联合培养计划，比如“二加二”或是“三加一”培养模式，授予学生两个文凭。据我所知，黑龙江大学与新西伯利亚大学在数学和物理方面有联合培养计划，与远东大学也有一些合作。莫斯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在深圳建立了联合培养学校。圣彼得堡大学也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协议，将在哈尔滨建立联合大学。据统计，俄罗斯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是中国，最大目的国也是中国，大约有25%的出国学生选择到中国学习。从中可以看出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将越来越多，前景非常广阔。

此外，希望两国在学术评价、学术话语方面展开合作，比如互认更多的科研成果，圣彼得堡大学职称评定时认可中国的CSSCI期刊论文，中国的一些高校认可俄罗斯的BAK期刊论文。这对于我们两国间的学术交流大有裨益。

(关秀娟：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王雨欣：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俄]罗季奥诺夫：圣彼得堡大学)

① 张西平：《把中国介绍给世界：外语类大学的新使命》，载《国际汉学》2021年第2期，第7页。

② 李明滨：《走进俄罗斯汉学研究之门》，载《国际汉学》2017年第1期，第11页。